

朝阳门外的彩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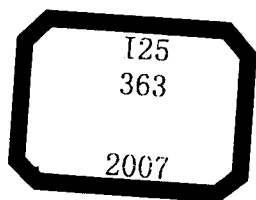
崇贞女学校的人们

〔日〕山崎朋子〇著

本书叙述的是上世纪
20年代到30年代，
日本一位基督教徒
清水安三先后与他的
两位夫人清水美穗、
清水郁子在北京
朝阳门外的贫民窟
创立崇贞女学校的
曲折而真实的历史，
讲述的是战乱环境下
中国、日本与朝鲜
这三个国家的少女们的
一个又一个生命的故事。

朝阳门外的彩虹

崇贞女学校的人们



〔日〕山崎朋子○著

邢丽荃 吕莉 李尚波 译

李恩民 监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朝阳门外的彩虹：崇贞女学校的人们/(日)山崎朋子著；邢丽荃，吕莉，李尚波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ISBN 978 - 7 - 208 - 06805 - 6

I. 朝... II. ①山...②邢...③吕...④李... III. 报告文学—日本—现代 IV. I31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19741 号

策 划 陈丽菲
责任编辑 洪 煜
助理编辑 赵 亮
封面设计 陈 楠

朝阳门外的彩虹

——崇贞女学校的人们

[日]山崎朋子 著

邢丽荃 吕 莉 李尚波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c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华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25 插页 2 字数 241,000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250

ISBN 978 - 7 - 208 - 06805 - 6/I·368

定价 22.00 元

内 容 简 介

二十多年前的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日本电影《望乡》、《追捕》等首次登陆中国公映,使长期处于闭塞状态的国人突然间大开眼界,从而引发了一场持续甚久的热恋日本影视的狂潮。阿崎婆、杜丘、真由美等剧中人物的个性凸显,让观众难以忘怀,而塑造这些银幕形象的演员高仓健、栗原小卷等更成为年轻男女的偶像。本书《朝阳门外的彩虹》就是《望乡》原创作者、著名作家山崎朋子女士的又一部让无数读者感受人性与灵魂的力作。

这本书与《望乡》的写作手法一样,是通过实地采访整整花了十年的时间而写就的纪实性文学作品。它记述的是上世纪 20 年代到 40 年代,日本一位基督教徒清水安三先后与他的两位夫人清水美穗、清水郁子在北京朝阳门外的贫民窟创立崇贞女学校的曲折而真实的历史,讲述的是战乱环境下中国、日本和朝鲜这三个国家的少女们的一个又一个生命的故事。书中所述情节,既有悲欢离合,又有爱恨情仇;所谈主人公的个性,既有不可割切的傲骨之处,也有人性的软弱无奈。这段历史,这段故事,既发人深思,又令人回味无穷。

——摘自《监译者跋》

中文版序

《朝阳门外的彩虹——崇贞女学校的人们》是一部纪实性的文学作品，它描述的是1921年到1945年这25年间，发生在北京朝阳门外贫民窟的一所规模不大的女子学校的故事。名称为“崇贞女学校”的这所女子学校的创立者是日本人清水安三与美穗这一对年轻而清贫的夫妻，在那里执教的是日本人和中国人，在那里就学的是中国、朝鲜和日本的少女们。清水夫妇为什么要创办这么一所女子学校呢，他们是怀着什么理想来教授三个国家的少女们的呢？我想只要读一读本书《卢沟桥的枪声》这一章中清水安三所讲的下面的一段话，读者们就会恍然大悟的。

那是发生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不久的事情。当时，日中全面战争已经开始，日军为推进侵略和占领，作为其作战计划的一环，制订了大规模空袭北京东部重要交通要道沿街一带的计划。事先已获悉这一消息的为数不少的日本人和中国人都劝位于这一带的崇贞女学校的人们外逃避难。对于这样的劝告，清水安三是这样回答的：

如果（日军）想朝我们这个靠个人微薄的力量把日本和中国团结在一起的女子学校投炸弹的话，那就让他使劲地投吧！在隆隆的爆炸声中，那些保安队也许会被炸死，但我的学生、我所教的中国的那些女孩子们也会被炸死的啊。让学生们被炸死，而我这个当老师的却死里逃生，我不能这样做！我也干脆就死在这里算了。不，我要让人们看看，我是如何被日军杀死的！

简单地说,清水安三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为了从事“把日本和中国团结在一起”的工作而在北京郊外的贫民窟开始了女子教育事业,为了这一事业,他甚至敢于挺身而出反对自己祖国即日本的军队,抗议他们乱杀无辜的行为。与清水安三这位胸怀大志的男子汉心心相印的两位女子,则倾自己的一生之力扶助了他的事业。《朝阳门外的彩虹》正是描述这一动人事迹的一本书。

作为一名研究女性史的作家,我为什么要写这么一本书呢?答案在于我特别关心“亚洲女性交流史”这一研究课题。我一直认为,研究一个国家的女性史如日本女性史固然重要,但对现实的需要来说,研究“亚洲各国女性交流的历史”却更为迫切。不过,由于我不太谙熟外语,所以能做到的也只是去探寻“日本与亚洲各国的女性交流的历史轨迹”而已。

如果要列举一下迄今的一些成果的话,我首先要提起的是详细描述了海外日本妓女悲惨生活的《山打根八号娼馆——底层女性史序章》(1972年)及其续篇《山打根的墓》(1974年)。这两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望乡》之后,在中国放映,据说深受大家欢迎。我的另一部作品《被撕裂的人生》(1978年)记录的是日本人移居中国东北的故事以及在那里所发生的一桩桩人间悲剧。此外,部头比较大的《亚洲女性交流史》(1995年)记述了近代前半期“日本与亚洲各国女性交流的史实”,是计划中的亚洲女性交流通史的一部分。

上述这些著作中,《山打根八号娼馆》与《山打根的墓》被合为一册译成中文,题名为《望乡——底层女性史序章》(作家出版社1998年出版)。与这一内容相关的记述了我的人生经历的日文版纪实文学作品《到达山打根——我的人生之路》(2001年)也以《通往〈望乡〉之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为名被翻译出版。所以说,这本《朝阳门外的彩虹》是我在中国出版的第三本书。

本书日文版刊行当初,就有幸得到中国读者的积极推介,如新华通讯社报道了东京分社特派员高红撰写的很有见地的评论文章。文化栏目丰富多彩的《南方周末》报社的王寅先生在翻译成寅女士的陪同下曾专门前来登门采访,并写下了长篇报道。清华大学王中忱教授在权威性的书评杂志《书城》上,发表了《上帝儿女的国籍》一文,评论既尖锐又中肯。在日

本，朱建荣教授、清水贤一先生和隅谷季雄先生也积极地为读者推荐了本书。抱着极大的热情精读了全书，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自愿挑起了组织翻译本书这一重任的是樱美林大学的李恩民博士。非常认真地翻译了本书的译者是目前在东京工作的邢丽荃女士、李尚波女士以及在北京工作的吕莉女士。其中吕女士曾参加过《望乡》和《通往〈望乡〉之路》的翻译工作。在此谨向各位友人为本书的翻译和出版所做的不懈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

对于作者我来说，用全身的心血和灵魂谱写出来的以中国为舞台的这部作品能够有机会与中国读者见面，这是令人感到无比欣慰和振奋的事情。日本在上个世纪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曾对中国在军事、经济甚至生活方面进行过侵略和掠夺，这是不可争议的事实，但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像清水安三这样的日本人不乏其人。如果通过这本书能使人们了解到这一点，对我来说这也是无比高兴的事情。

在中文版即将出版之际，我愿向中国文化部原副部长刘德有先生和樱美林大学佐藤东洋士校长表示谢意。刘先生为我的采访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提起他的大名可能无人不知，但对于樱美林大学的佐藤校长，我愿稍费笔墨作一介绍。

樱美林大学是清水安三离开北京朝阳门外的崇贞女学校后在东京重新创建的学校。佐藤东洋士先生的母亲在年轻时曾是崇贞女学校的音乐教师，那时她的生活并不富裕，家里当然也就雇不起保姆，有时不得不把还是婴儿的东洋士带到教室去上课。而当东洋士哇哇啼哭时，班里的那些学生们，也就是中国、朝鲜和日本的少女们就会齐心协力来照顾他。佐藤东洋士就是在这样的国际化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而今他已经是一位积极推动中日教育交流的大学校长了。

最后我在此祈愿，本书出版后能有更多的中国读者喜欢它，同时也期望着读者能够理解并铭记这一事实：即使是在曾以侵略为“国是”的战时的日本，也有与此完全不同的思想理念并贯穿一生将其付诸实践的人。

山崎朋子

2006年9月

目 录

中文版序/001

序言 沿着朝阳路向东走去/001

第一部 通向中国之路/011

从几度邂逅开始/012

在儒教之国传教/029

年轻的横田美穗的选择/041

第二部 在贫民窟创建女子学校/055

救救受灾的孩子们/056

读书、习字与学手工技术的女子学校/074

吴芝兰——从“暗门子”到牧师之妻/083

妻子与丈夫各居一方/100

美穗的遗骨埋在中国/112

目 录

第三部 继承遗志的女性/129

敢向月亮求婚的甲鱼/130

小泉郁子的决心/138

卢沟桥的枪声/155

在军部和外务省的夹缝中/167

三个民族的少女们/179

奔向社会主义的少女们/194

第四部 天桥的救济院/211

北京的另一个巨大的贫民窟/212

爱邻馆的日日夜夜/227

被逐出京/243

尾声 置身于樱花美丽的学林/257

著者后记/276

监译者跋/280

序言 沿着朝阳路向东走去

在有些晴爽并被人们称之为花季的4月的一天，我沿着连接首都北京和经济大都市天津的大动脉公路——朝阳路向东走去。现在屈指一数，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虽说在日本这时还需要穿大衣，但在北京的一条近30米宽的大路上，说成是初夏也不为过的太阳光在欢舞着，大小车辆一辆接一辆地在穿梭着。在这些车来人往的潮流中，只有从日本专程而来的我、翻译源川澄子以及中国友人吕莉、对这里的风土人情比较熟悉的孙立峰四个人，既不乘汽车也不骑自行车，凭着自己的两条腿向东走去。

大路两旁林立着八至十层的高楼大厦，有的甚至有二三十层高。所以，朝阳路就好像是这些大厦之间的峡谷，吹在脸上的风是那樣的清爽，风中时而夹杂着绒线团般的东西，这无疑就是柳絮了。即使是在城市现代化建设发展得这么快的这片土地上，昔日的柳絮还跟往常一样，从某些角落飞出，向人们预告着春天的到来。

我们首先去的地方是地铁朝阳门站，这里曾是北京城东出入口朝阳门的旧址。对北京市民的生活来说，被命名为“朝阳门”的这座城门曾是一座非常重要的大门。与城内繁华的市容不同，在城外，沿着朝阳路形成了一大片贫民窟。因为我一心想亲眼看一看昔日朝阳门外的贫民窟在什么地方，所以到了朝阳门城址的朝阳门地铁站后，我

们决定从这里开始步行着寻找。

走了大约十多分钟后，我通过吕莉向路边的中年妇女打听道：“你知道芳草地在哪里？陈经纶中学在哪儿吗？”被询问的妇女好像一眼就看出了我是日本人，一边按捺着好奇心一边告诉我说：“这里就是芳草地呀，陈经纶中学嘛，再往前走一点儿，到东岳庙前面的那条路往右拐就是了。”

我们继续向前走，在晒得让人不断流汗的阳光下，道路的两旁，依然是林立着的现代化高楼大厦。如果回答我们说“这里就是芳草地呀”的那位中年妇女的话属实，那么这一带肯定就是昔日北京最大的贫民窟了。

朝阳门外，也就是被称之为“芳草地”的这一带，虽然在清朝时期就比较贫困，但在清朝灭亡进入中华民国后，却变得更加贫困。这里是北京城内生存竞争失败者的聚集地，不，不仅如此，甚至可以说，它是中国全社会生存竞争惨败者流落安身、勉强生活的地方。当时，这一带的地名街道尚未确定，只是泛泛地被通称为“芳草地”。

翻开汉语辞典，对“芳”是这样记载的，说它具有“芳香、名声美好和美丽”的意思，因此可以说，“芳草”就是指“带有芳香的草或者是散发香味的花草”。但是，仅凭我对汉字和诗词不算丰富的知识来判断，“芳草”还被称为“蓬”，即具有“杂草丛生”的意思。

与日本的蓬不同，中国的蓬长得很高，呈圆形，虽到冬天干枯后被北风一吹就会折断，但被折断的蓬就会形成圆形灯笼的模样在大地上滚转飞扬，它的叶子和茎干具有很浓烈的味道，这才是取名为“芳草”的真正原因。北京朝阳门外这一大片地被称之为“芳草地”，也正说明这里不适合于人群居住，只不过是蓬蒿之类的野草丛生繁衍的荒凉之地而已。

这个曾被委婉地称为芳草地的荒凉之地，这个从清朝到民国时期一直都是北京最大的贫民窟的这片土地，我一个异国他乡的女子为什么非要来这里不可呢？而且在这广阔的区域里，为什么偏要访问一个名叫陈经纶中学的学校呢？

关于这个问题,不妨用一句话来回答,那就是,在曾经闻名全国的这个贫民窟里,有一位日本人——与其这样说,倒不如说正因为这个日本人以及那些与他同心合作的为数不少的日本、中国和朝鲜的女子的动人事迹——震撼了我心灵的缘故。这个人是一个以“救济中国贫穷女子”为己任、献身于“女子教育”的日本男子,他和各个国家的那些女子们跨越各自的国境、超越凡俗思想而从事无私奉献的活动场所,就是坐落在芳草地的一所学校,即现在的陈经纶中学。

这样的记述也许顺理成章,但那位令我非常关注的人物,即为中国贫民窟的女子教育事业而辛勤工作的那位日本男子到底是谁呢?如果用一句话来回答的话,他就是清水安三。

即使是在信息充斥的现代社会里,提到清水安三,我也不得不承认知道他的人不多。关于他的简历,我这样来描述。他出生于1891年,一生度过了97个春秋。他以信仰基督教为本,虽然是日本人,但却总是全力去关心那些挣扎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中国和朝鲜的社会最底层的人,在这些最底层的人群之中,他又特意去帮助那些处于弱势的少女们去自立。而且他的事业,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女子教育”事业,而这一事业并不仅仅是依靠他自己,而是与他的妻子共同完成的。甚至可以说,这一事业并不是以作为男性的他“为主”,以作为女性的妻子“为辅”这一传统模式取得成功的,这一事业是作为“丈夫”的他和作为其“妻子”的她,各自为了实现自我而通过双方的有机结合这一形式来最终完成的。

不,还不仅仅是这些。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要让中国贫穷阶层的少女们从精神上到职业上都能自立,同时,他们还具有让中国、朝鲜和日本的少女们团结起来,形成跨越民族意识障碍的这一国际主义思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实际所采用的教育方法是放纵式的自由教育,而这在当时日本文部省所管辖的女子学校里是绝对不可想像的。而且,为了那些就是用教育手段也拯救不了的赤贫阶层以及贫困地区的少女们,较之于“教育”活动,他们又

清水安三(1891—1988),
1940年,49岁。



向“生活”活动方面迈出了一步，开始了具有社会福利性质的救济活动。

清水安三和他的妻子共同创办的从事女子教育的学校名为“崇贞女学校”，社会福利救济院名为“爱邻馆”。崇贞女学校就建在北京第一贫民窟——朝阳门外的芳草地，而“爱邻馆”则是建在被日本人称之为“北京的浅草”的娱乐街——北京第二贫民窟天桥区。

突然，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与笔直林立的西洋大厦不同的中国式的门楼和钟楼，我想这也许就是刚才那位中年妇女所说的东岳庙了吧。走近一看门牌，果然如此。这是一个祭典中国民间信仰中的大神之一——泰山东岳大帝的庙舍。看来，这个庙再往前走一点儿的马路对面，就是我想访问的陈经纶中学的校园了。

我和吕莉他们，等到绿灯后穿过了朝阳路，再向前走了一会儿，就看见了面向马路用烫金字横写着“陈经纶中学”的白色大门。

走进校门便是长长的一条大路，大路两旁长着茂盛的树木，形成了一条弧形的长廊，好像遮挡住了街市的喧闹。校园里，虽然近几年建造的形似欧美式的建筑物较多，但也保留有一部分古老的中国式的校舍，从这里我已经感觉到这所学校不是近些年才开设的一般的学校，而是经历了相当长的岁月的磨难后成长起来的一所学校。

我们找到了学校的办公室，并被允许巡视校园一周。如果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作为日本人的我，要想申请看一看一个继承了曾由日本人创建的女子学校校风的现代中学，一定会被怀疑是在搞间谍活动而遭到严厉拒绝的。但是，那个不幸的政治运动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正是中国与世界接轨并走向民主之时，所以我的愿望很快实现了。不仅如此，学校还派了一位年轻的女职员给我们做向导。

在还保留着少女气息的女职员的引导下，我们参观了好几栋楼，那些用钢筋水泥建成的欧美式建筑，无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建的，那些用砖瓦建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物，从那古色古香的样子就可以断定它是二战之

前的东西。如果是这样,这些建筑物毫无疑问就是以前的崇贞女学校,是虔诚的日本基督教徒清水安三和他的志同道合的女性们一起苦心经营而建造的了。

看到这些,我已经感慨万分,不过更让我心情不能平静的是那位女职员把我们带到“校史陈列室”的时候。在校史陈列室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陈经纶中学是现代中国的一所公立学校,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以“北京女子第四中学”为名而创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由女子学校变成了男女生共学的“朝阳中学”,“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为了纪念给学校捐赠巨款的香港人陈经纶,遂改名为“陈经纶中学”,共有40多年的历史。可是,在校史简介的壁板上却写着“本校有70年的历史”,同时作为该校的前史列举了“崇贞女学校”的名字,并陈列着清水安三及与他一起在此工作过的女性们的照片。

也就是说,陈经纶中学,本来完全可以仅从由中国民众创办的北京女子第四中学开始来展示自己的历史,但它还是追溯到了由日本人清水安三等人创立经营的崇贞女学校的时代。对近代中国来说,日本是侵略国,因此日本人所建立的学校,虽说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没有直接关系,但被视为与侵略政策有关而被彻底否定或者从历史上抹去,可以说这是很通常的做法。但惟有清水安三在北京第一贫民窟——朝阳门外的芳草地所创建的崇贞女学校,不但没有被否定和抹消,反而被认为是中国人民、特别是对贫困少女们的自立和解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的学校,并给予了很高的历史地位。

我感到自己的心情有点激动,遂不加思索地转向给我们当向导的女职员,对她用日语说:“我非常想知道清水安三先生在中国所做的事情,所以专程从东京来到了北京。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情了,我原以为清水先生的名字谁都不会记得了,但现在在这里我看到了挂在墙上的他的照片,感到非常高兴!”

听了吕莉的翻译后,她对着我笑了笑,用清脆的声音说:“中国人吃水不忘挖井人!”

设置在北京陈经纶中学校园内清水安三先生的铜像(樱美林大学对外中心提供)。



记不清是从哪里听来的,但我知道在以前的中国有“吃水不忘挖井人”这句格言。与日本不同,少雨的中国把水视为至宝,在没有河流的地方只有井才是他们的生命之源,所以挖了井的人就是恩人,是绝对不能忘记的人。

女向导员用“挖井人”来做比喻的意思就是说,对于日本人清水安三,这位陈经纶中学的前身崇贞女学校的创始人,中国人并没有否定他,而认为他是“不能忘却的人”。在北京城外芳草地贫民窟,清水安三有关女子教育的实践活动,至少具有这样的意义。我体会到自己热衷于这个人的研究没有错,这一点好像在这里得到了证实,我感到心安了许多。

尽管崇贞女学校作为北京市立陈经纶中学的前身受到人们的肯定,但它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已经不存在了。为什么我对由日本人清水安三创建的这所很小的女子学校如此感兴趣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好多事情不能不与我的个人的经历和心绪联系起来。

这里稍费笔墨叙述一下我自身的经历。我在25岁之前的一个时期,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与一个在东京大学留学的朝鲜青年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他是一个出生在济州岛,从木浦中学毕业后来日本留学的青年。他的思想与当时在日本的大多数朝鲜青年一样,不是要建立一个以“自由”为名让“极少数有权有势的人”能为所欲为的社会,而是要建设一个保障让“所有的人”都能过上“人间生活”的社会。

他20岁左右来到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本科毕业后又考上了研究生,虽然研究生毕业了,但在民族歧视意识很强的那个时代,他根本没法找到工作。也许是那个让日本经济受惠的朝鲜战争刚刚结束、街上到处都是失业者的缘故吧,那些能用得着知识和发挥自己才能的职业都婉辞拒绝了他,他只能干一些简单的劳动或者是临时的工作。

一个毕业于日本最高学府的研究生,只因他不是“日本人”而是“朝鲜人”,日本社会就不能包容他。为此,这位青年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为保障让“所有的人”都能过上“人

间生活”的社会主义运动之中。把他所做的一切看得都非常高尚的我有些心动，便慢慢地开始接近他。就这样，在相识几个月之后，我们不顾双方父母的反对，过上了事实上的夫妻生活。

因为我非常信赖并喜欢他，尊重他的思想以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那种人生观，总想着让他有充足的时间去参加运动，所以，我努力工作，白天在一个小公司做职员，晚上在一个咖啡馆当服务员。我渐渐地与他的朋友们熟悉起来，虽然生活贫困到了极点，但可以说我们心里面却是非常充实。

在这些日子里，我想到的是——虽然我是一个很普通的日本女孩，但希望通过与作为朝鲜民族一员的他共度人生，能在这两个身上刻着不幸历史的民族之间架起一座小小的“信赖之桥”。我希望，我只此一次的“人生”，会对我所信赖的他有用，而同时，他也在希望他的“人生”能对一个刚刚将“妇女解放”作为自己终身奋斗目标的我有很大的帮助。也就是说，我们期望的是双方能在“婚姻”与“人生价值”、“民族解放”与“妇女解放”这四者有机结合中共度一生。

但是在一起生活了不到两年之后，我就拿着自己仅有的一点衣物，不得不走出了与他一起生活过的那间小屋。这既不是因为我們之间没有了爱情，也不是因为双方相互失去了信任，而只是因为我很想把全心全意为朝鲜民族、为自己的祖国而奔波的他从困惑中解放出来、给他以自由。

那个时候，在旅日朝鲜人的心中，对日本人的感情是憧憬与排斥相互交错在一起的。能与日本女孩谈恋爱的朝鲜男子虽然常常是令人羡慕的对象，但反过来有时会被看作是丢弃了民族之心的叛逆者。在他与我的周围，这样的微妙气氛也不是没有。如果他是一个普通人的话，这些小小的摩擦也许是可以解决的，可因为他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不选择朝鲜女子而选择日本女子做妻子，这一举动在他的同志之中引发了心理上的反感情绪，他的处境变得比较艰难了。



访问陈经纶中学，与原崇贞女学校毕业生交谈。
前排中央为著者。

作为朝鲜人的他，人生的最大目标就是真正解放长期以来受压迫的朝鲜民族。如果作为妻子的日本人的我，对他的这一运动有负面影响的话，该怎样做呢？不是他不好，也不是我有罪，而只是在旅日朝鲜人社会圈子里的人们的心灵深处，还不能允许朝鲜男子与曾经是侵略

国的日本女子结婚。

我为此事伤透了脑筋，以至于人都瘦了许多。因为他是一位学识渊博、人格上值得信赖和尊重的人，所以才选他作为我的终身伴侣。但是我意识到，只因为有我这样一个日本妻子，才给以朝鲜民族解放运动为己任的他带来如此大的困惑。因为我非常爱他，所以在痛苦之中，我决心尊重他为之奋斗一生的意愿。因害怕自己不敢面对，我连一封信也没有留，就这样地与他分手了。

对于在年轻时有过这种经历的我来说，清水安三在北京城外崇贞女学校所从事的事业，虽说不是全部，但我看到其中的大半部分与我过去的思考有一致之处。虽然我是女性而清水安三是男性这一点不同，但他作为属于侵略国即宗主国民众中的一员，力图与沦为这个国家殖民地的国家的民众保持联系，他尽可能地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对殖民主义国家所犯的罪过哪怕是偿还万分之一也罢的这种想法，我感觉到，在这一点上我们几乎是完全一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长起来的，我在人生的入口处就受到了挫折，但比我父辈还年长的清水安三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此，我真不知道是该说“真了不起”呢，还是该说“令人惊喜”……

从陈经纶中学校史陈列室走出后，我又参观了校园内的几栋设施。然后又回到了用烫金字写着的“陈经纶中学”的校门口，在这里向那位给我们带路的女职员道了谢，